

《行水金鉴》作者考辨

高 洪 钧

《行水金鉴》是一部综述我国古代水利事业的历史资料书,产生于清代前期,凡一百七十五卷,约120万字。作者署名为“江南按察使傅泽洪撰”。其前并有自序云:“仆本固陋,谬为水官,尝寒暑风雨于泥淖畚鍤间者二十余年。但因人成事,无所建立,深自愧悔。用是积数年心力,目眇手披,渔经猎史,远稽胜国之实录,近述世祖、圣祖之训旨,参以众说,辑成是书。”下署“雍正三年(1725)冬十月朔,间山傅泽洪题于淮扬官署之铸错草堂”。然细考之,《行水金鉴》实出自傅氏下属幕僚郑元庆之手。

郑元庆(1660——?),字芷畦,一字子余,因慕汉代谷口郑子真的为人,修道守默,故自号“小谷口”。他是浙江归安(今属湖州市)学生,自幼通经史,覃思著述,期有用于世。毛奇龄、朱彝尊、胡渭诸名人,并折行辈与之交。家贫,寄迹幕府。所著有湖州府志《湖录》120卷、《礼记集说参同》80卷等,皆未刊。六十五岁时,“因念数十年昕夕与古人相晤对,丹黄甲乙,西涂东抹,鄙章句短订之学,独行己意,肆为一家言,各成稿本。……其中斟酌经史,较量失得,颇关世道人心。件目既多,未能悉举以问人。先以弁首诸序,灾之梨木”。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见序刊于清雍正二年的《小谷口著述缘起》。里面收录了他十八部未刊书稿的序文,讲述了各书的成书过程和主要内容。其中包括有《湖录序》、《礼记集说参同序》,还有《今水学

序》和《小谷口荟蕞序》等。另并附载了一万二千余字的《今水学略例》全文。

对读郑元庆作于康熙六十一年(1722)的《今水学略例》，和成书于雍正三年的《行水金鉴略例》，不难发现，后者二千来字，全是前者的节录。如开篇都说：“江淮河济为四渎(见《风俗通》)。渎者独也，各独出其所而入海(见《释名》)。”又如说：“中国川原以百数，莫著于四渎而河为宗(见《前汉书》)。河曰河宗，四渎之所宗也(见《穆天子传》)。”等等，不仅整段文字相同，连所注出处也都一样。而被节略了的，则是郑元庆与人论学和所举例书的要义等。如说：“解《禹贡》者最多，惟胡处士渭(字肱明)所著《禹贡锥指》考据详明。……予曾与处士析疑辩难，颇多领会，故兹录采撷为详。”又如说：“山阳阎征君若璩(字百诗)，精于地理，其论四渎也最核。……曩予与征君辩论草堂，多所就正。”等等，如把这些“略例”全给抄上了，岂不明显看出《行水金鉴》是郑元庆所著的吗？欲盖弥彰，但在正文中还是露出了马脚。

按照《略例》(编辑凡例)要求，《行水金鉴》是以江淮河济“四渎”和大运河五水系为纲，以朝代时间先后为序，分别摘录历代载籍中有关各水系的源流、变迁和整治沿革等情况的资料，并相应注明出处而汇纂成的。即如郑元庆在《今水学略例》中所说：“其于古也不嫌其略，于今也务得其详。”凡郑所举自《禹贡》及诸经之传注，列史之河渠沟洫、山经地志、稗官小说，乃至历代疏濬之方、名臣儒者之奏议论说等，都在《行水金鉴》中反映出来了。如郑元庆在《行水学略例》里说：“云间周竹岗先生洽，向参靳文襄幕，极雅重之。每向予言靳公治河，兼行屯田，若非奉行者不善，亦何至今日尚靡费河工数百万金钱。初不解其语，及阅先生《治河杂说》(一作《河防杂说》)、《看河纪程》二书，已见其经济之学。”这一段话在《行水金鉴略例》里也是被节去了的。但我们在《行水金鉴》卷58至卷60里，可看到大量《河防杂说》的原文；卷

161至卷163,则全部采自《看河纪程》。显然,这些都是郑元庆采入的。其他还有明潘季驯的《河防一览》、万恭的《治水荃蹄》、刘天和的《问水集》,以及清靳辅的《治河书》、张伯行的《居济一得》等,“皆摘录之”。

又如胡渭的《禹贡锥指》,郑元庆在《今水学略例》中说是“采摭为详”。《行水金鉴》里也是这么做的,而且卷7所引还有“小谷口按”语,最后并说:“高地对上文平地,是发前人所未发。拙明先生作《锥指》时,寓吴阊僧舍。时予亦寓吴。先生以为禹河随西山下东北去十五证示予,曰:‘此辨证古事,无逾此者。’予甚赅之。今录其书,如昨日之两人晤语矣。”如此表述,能是傅泽洪之所为吗?他又什么时候与胡渭“晤语”过?这是一。

据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著录说:《行水金鉴》所征引各书原文有未备者,“亦间以己意考核,附注其下”。但这“己意”并非出自傅泽洪,而是标明为见“郑元庆《小谷口荃藂》”,或简作“《荃藂》云”。如卷6末关于堤防湮塞的长篇议论,和卷21后的大段按语等。又如卷64所引《扬州府志》文后有《荃藂》云:“予尝闻之阎百诗先生云,高家堰相传汉广陵太守陈登筑。……予因笑语先生曰:‘高堰一线之堤,包藏七十二道山河之水,万一有失,淮扬二府其鱼固不足惜,其如运道何?’先生瞿然曰:‘善问哉!善问哉!……’”这也就是郑元庆在《今水学略例》里说的“与征君辩论草堂,多所就正”事。又如卷147所引张伯行《居济一得》提到了杨家坝事,后有《荃藂》云:“坝则两岸民田受害,不坝则西湖之水又涸。然则如何?惟有改坝为闸,相机启闭之法得矣。”此为二。

《荃藂》即《小谷口荃藂》。小谷口为郑元庆的别号。其于雍正二年作有《小谷口荃藂序》云:“曩在曝书亭观书,竹垞先生(朱彝尊)语予曰:‘昔广文博士,集当世事虽多而最小者,目之曰荃藂,后人乃误呼为会粹。此君家旧业也,子具此学识,曷仿而为之,亦足以解人颐。’予唯唯,乃于浏览之余,择其可涤我心胸,资人镜

戒者辄录之，数年成若干卷。”又说：“《荟蕞》之始，从辛巳（1701）至今二十又四年，……其中颇有碎而不小者，上关庙堂之典故，下切民生之利病；精之则为身心性命之学，粗之亦见考订纰缪之长。”但“当日随见随录，本无伦次”。而今把它作为补充说明，“附注”于《行水金鉴》相关引书下，岂是傅泽洪“积数年心力”所能成之者！

其三，《行水金鉴》里还收录了郑元庆的其他一些水利论述，如卷154、卷155注明为出自“郑元庆《七省漕程》”；卷160注明为见“小谷口《两河薛镜》”。还有多处标明为“《今水学》云”等，而且都是以作者第一人称口气叙述的。如卷160解释“两河薛镜”时说：“此言黄运两河之梗概，录成，人见之曰：‘此湖州镜也，两河千里而遥，一目了然矣。’吾湖制镜始于李唐薛氏，故曰薛镜。”又说：“闻之前辈胡肫明先生曰：河之出海，旁口日多，则正口日塞；淮之会河，支流益分，则经流益弱，皆潘宫保之所禁也。旨哉三说，得治河之三昧矣，我又何敢复赘一辞。”另外，卷173《夫役》篇最后一段有400余字论及“设立河兵，专供力役”事，标明为见自《今水学》；核对之，与《今水学略例》最后一段也只字不差。

《今水学略例》记事到康熙末。傅泽洪分巡淮扬道是在康熙五十九年。所以《行水金鉴》里也记载有傅泽洪的几件事。如卷173里写有“圣祖仁皇帝康熙六十年正月日，淮扬道傅泽洪详河营兵饷迟延借口之弊事”，又“圣祖仁皇帝康熙六十年五月日，淮扬道傅泽洪请查河兵力作事”等，均引自《嚼梅轩偶存》，非傅泽洪自述。这和同卷所载“圣祖仁皇帝康熙二十二年五月初九日，总河靳辅题为请修上流堤岸以保运道万全事”，以及“圣祖仁皇帝康熙三十八年五月日，总河于成龙等题为岁夫徒滋苦累等事”一样，是作为河工纪事资料收录的，且都置于郑元庆的论述前。

所以综合看来，《行水金鉴》一书，当是以郑元庆的《今水学》为基础，按照《今水学略例》要求，汇辑古今有关河事资料，加上

他自己的考订、论述和补充等编纂而成的。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评价说：“叙水道者，《禹贡》以下，司马迁作《河渠书》，班固作《沟洫志》，皆全史（此指《史记》和《汉书》）之一篇。其自为一书者，则创始于《水经》，然标举源流，疏证支派而已，未及于疏浚堤防之事也。单锺、沙克什、王喜所撰，始详言治水之法。有明以后，著作渐繁，亦大抵偏举一隅、专言一水。其综括古今，胪陈利病，统四渎分合、运道沿革之故，汇辑以成一编者，则莫若是书之最详。”后人仿此体例，相继又编有《续行水金鉴》和《再续行水金鉴》。1955年，南京水利实验处并编印有《〈行水金鉴〉及〈续行水金鉴〉分类索引》，甚便检索。

但就是这样一部颇有影响的水利书，出版时竟署作了“傅泽洪撰”。各公私藏书目也都是这么著录的。何以故？

原来，郑元庆曾于雍正元年作有《今水学序》云：“河工，今国家一大漏卮也。……恭诵先皇帝上谕有云：治河专以筑堤，终属无益。予之为是书也，意在斯乎！意在斯乎！沧州先生（陈鹏年），予二十年文字交也，来为河使者（曾任两河总督），深喜其可与言此；力疾脱稿，先以《略例》（此指《今水学略例》）邮寄中州。而沧州已攀龙髯而上升矣（按：陈卒于康熙崩后，即雍正元年）。乃次第卷帙，纸盈二千有奇，内之笥中；名曰《今水学》者，亦第成其为今日一人之水学而已。有其体，未见诸用，是则可慨也夫。”其时郑元庆正在淮扬道上当幕僚，序中有谓“予客淮南北，前后且数载”；又雍正二年撰《小谷口著述缘起序》，即“书于黄淮交汇处”。而今陈鹏年已故去，再无可与言河事者；正愁《今水学》书稿“有其体，未见诸用”时，不想竟被他的上司淮扬道官员傅泽洪看上了。

傅泽洪性“本固陋，谬为水官”，来在淮扬道多年，“无所建立”。但为了捞取政治资本，以为进身阶，得知郑元庆积有二千余页的《今水学》书稿，乃利用职权之便取了来。“目眇手披”，见书中并无他半点著述痕迹，于是在卷142中所录康熙谕旨下，加了段

自己的话：“臣泽洪，世受国恩，捐糜难报，自淮扬罢守以后，效力河干，浮湛于海防宿虹外河诸厅，量移监司，仍专理河务，几三十载。虽于睿算精微，不敢自诩窥测；惟是辛劬畚鍤，宵夜靡宁。遑恤胼胝之劳，时凜旷瘵之耻。幸赖遭逢圣世，坐享休明。聆大哉之王言，如纶如綍；溯巍乎之帝业，式玉式金。臣泽洪敢效赓扬，自忘微陋，谨拜手稽首，恭记于尾。”另又写了篇所谓的序言；改《今水学略例》为《行水金鉴略例》，更书名作《行水金鉴》，然后署上自己的官衔和大名，就在自己主持下的淮扬道署刻印出版了。这就是流传至今的雍正三年淮扬道署刻本《行水金鉴》。后来又有乾隆间傅氏刻本，乃至四库全书本等，皆署作“江南按察使傅泽洪撰”。

这是一起上司窃冒和侵犯下属著作权的事件。傅泽洪贪天之功，在《行水金鉴序》中只字未提郑元庆的名字，仅仅笼统地说“参以众说，辑成是书”。他倒是“因人成事”，由淮扬道员升任为江南按察使，且“高坐危言，晏然自以为千佛名经中尊宿”。而郑元庆则“一生连蹇，寄鼻息于高牙大纛之间，与所谓刑名钱谷之辈旅进旅退，糊口代耕”，“其后病风而归，不复出门”。以至乾隆三年（1738）诏开三礼馆，有临川侍郎李绂叹曰：“如郑芷畦之博物通经，庶几可应兹选，惜乎已死。”史学家全祖望则为之作《空石志》云：“芷畦生平著述，尚有《行水金鉴》，为河道傅君所开雕盛行，顾罕知其出于芷畦也。”（转引自《国朝耆献类征》卷418《郑元庆传》）但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却著录说：“《行水金鉴》一百七十五卷，国朝傅泽洪撰。泽洪字稚君，镶红旗汉军，官至江苏按察使。是书成于雍正乙巳（三年），乃其为淮扬道时所作。全祖望《鮚埼亭稿》有郑元庆墓志，以为出元庆之手，疑其客游泽洪之幕，或预编纂，然别无显证，未之详也。”

事实上，要说“显证”和详情，读一下郑元庆的《小谷口著述缘起》，也就一清二楚了。可惜这书当时未为四库编修官们注意；或许

是印数少，流传不广，所以也不见《四库总目》收录。但未见着不等于不存在。郑元庆在《今水学序》里说得明白：“恭诵先皇帝上谕有云：治河专以筑堤，终属无益。予之为是书也，意在斯乎！意在斯乎！”郑元庆著此书，是为宣传康熙的治河思想的。“煌煌天语，……治河者惟奉之以为金鉴”，这是《行水金鉴》的题意，语出《今水学略例》，行水犹言治水。他的《今水学略例》，就是《行水金鉴略例》的母本。他“次第卷帙，纸盈二千有奇”，分量足与《行水金鉴》相当。而其中作为附注的《小谷口荟蕞》，正是他花了二十四年时间读书、考证的结果。何况在此前，他还编有《湖录》、《礼记集说参同》、《石柱记笺释》等大著。因此，无论就学识、才能和经验言，《行水金鉴》出自郑元庆之手，是毋庸置疑的；傅泽洪投机取巧，利用职权之便，将此书推出出版，冒为己作，是弄虚作假、沽名钓誉的剽窃行为，无怪乎他要把自己的官署取名为“铸错草堂”了。今天我们有必要还历史以真实：《行水金鉴》只能是清人郑元庆撰著；傅泽洪充其量只是个出版者而已。是以辨正之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天津师范大学图书馆